

● 中国史

两司马治史之比较研究

俞文冉, 陈乃宣

(武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俞文冉(1963-),女,河北辛集人,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理论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邓小平理论研究;陈乃宣(1926-),男,江西南昌人,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理论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及中国近现代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

摘要 司马迁和司马光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位伟大的史学家,他们撰写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对我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二人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其著作也有明显的不同。从体例上来讲,《史记》为纪传体,《资治通鉴》为编年体。另外他们二人在历史视野、对待史实的情感、思想倾向以及材料的取舍等方向也有较大的区别。

[关键词] 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6-0707-07

司马迁与司马光,是我国古代史坛的两位大史学家。司马迁所撰《史记》,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史籍中的两部名著。《史记》为纪传体,以写历史人物为主;《资治通鉴》为编年体,以写政治史为主。两者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博采其长,不无裨益。

一、司马迁著《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 145—前 96 年)字子长,西汉时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汉武帝史官司马谈之子,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 145 年)。幼时放牧家乡,10 岁开始习古文,20 岁走出书斋,遍游全国。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38 岁的司马迁继父志作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开始撰写《史记》,至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成书,历时 14 年。《史记》共 130 卷,52 万余字,是一部誉满中外的我国古代的不朽的历史巨著,奠定了我国史学的基础。从《史记》的诞生开始,中国历史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学才开始在中国文化史上绽放出绚丽的异彩,给中华民族文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那纪传体例的开创;“实录”、批判的精神;历史纵横的贯通,中外兼视的宽广视野;人物特写的传神,战争描绘的逼真;以及“述往事,思来者”的鉴古知今的思维方法,大大促进了我国史学的长足发展,在我国史学史上树立起一座千古不朽的丰碑。正如鲁迅所颂的《史记》乃“史学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那千古卓绝的“一家之言”,终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是他留给后世的珍贵历史遗产。

《史记》上起轩辕,下迄汉武帝,记事 3 000 年。其中“本纪”12 篇,用编年体形式主要记述统治王朝和帝王的事迹;“书”8 篇,用综合论述形式,记述礼乐、天文历法、经济水利等主要典章制度;“表”10 篇,用谱

牒形式,理清三代以来众多侯国并存、错综复杂的重大史实;“世家”30篇,兼用编年和传记形式,记述周以来开国传世的侯国;“列传”70篇,用合传或杂传形式记述人物,其中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还有关于朝鲜、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地区的记载,是我国第一部主要研究汉武以来的通史。在一部《史记》中,用5种体裁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整体,在史学上是一个创新。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所谓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就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是将每一个能代表某一历史时代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归纳到他自己的名字之下,写成该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分开来是一篇独立的传记,合拢来,可显示某一历史时代的主要社会面貌。这些传记又分为本纪、世家和列传,本纪记皇帝,世家记贵族,列传记官僚士大夫。本纪虽以人物为标题,但不是传记体,而是编年体。所谓编年体,即将某一皇帝时代所发生的史实,按事件发生的先后,依次记录。实际上,本纪是世家与列传的纲目,而世家与列传则是本纪的注文。

《史记》的成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它是一部概述东西南北,横贯上下古今的通史。在编纂体例上也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以前,我国虽已有了《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历史著述,但无法与《史记》相比。如《尚书》,它是历史文件的汇编,不能算作正式史记。《春秋》《左传》《竹书纪年》,是按年、月、日编纂的编年体,只记述一个时代。《国语》《战国策》则是诸侯国别史,局限于地方的记述。《世本》只著世系而无详细事迹。我们知道,按编年体写史书,遇上无年月记载的史料,或考究不出时间的史料,则无法编排。无年月可考的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亦不易编入。远古时代史料稀少,且年代久远,一时无法考证,更难编入。所以,司马迁之前的史书,很难使人了解古今历史的全貌。一些诸子百家之类的书籍,虽记载一些史实,由于论证某些学术思想的需要而有所取舍,更显零碎片断,且多有渲染,不足当做信史看待。《史记》则是在时间上贯通古今,在地域上旁及四境,在内容上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从整体规模上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司马迁可称之为中国史学之父。我国历史学成为一个学术部门,是从司马迁开始的,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者。《史记》不仅在于它规模恢弘、体裁新颖,更重要的在于它内容的人民性和思想性。司马迁从他下狱、受腐刑的惨痛经历中,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称赞陈胜、吴广起义,将其事迹列入“世家”,以示崇敬;他致力刻画推翻“暴秦”的项羽的英雄气概,与狡诈无赖的刘邦做鲜明对比,不因项羽的失败而抹杀他的历史地位,将他的事迹列入“本纪”;他表彰椎埋屠狗出身,而敢于劫杀诸侯,为国捐躯的刺客;他称赞挺身仗义,保护弱者,敢与暴力抗衡的侠客;他敢于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同情人民的疾苦。他的爱和憎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公论。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对大量史料“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而且是一位思想家、儒学家。他对孔子称“至圣”,列入“世家”,孟子、荀子诸大儒均有列传。他对儒家思想,并非全盘接受,只是继承其合理部分。如提倡仁义、反抗暴力、厌恶战争等。儒家盛行“天人之学”,把一切自然现象解释为上天意志的表现。董仲舒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集大成者,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却不相信这一迷信说法,未把董的学说写进《史记》。

《史记》内容丰富,取材广泛。其资料、素材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古今图书。尤其是先秦古籍,凡汉代以前古书,无所不采。除经书外,还有诸子、文、骚、赋等。

第二,国家档案。司马迁入仕太史令以来,阅读和整理了许多当时皇家图书馆收藏的典籍、档案等珍贵资料,尤其是国家档案,例如:诏令、法典、记功册等,其中有许多是其他人无法见到的第一手材料。他写书时,充分利用了这一便利条件。

第三,亲身耳闻目睹。《史记》中有很多记载是司马迁得自当时人口说,或游历时所见所闻。有的来自他自己调查研究的材料,有的来自秦朝、汉初人的后裔,有的来自访问乡亲父老的口授,有的来自亲朋好友或其子孙。这些素材,可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是一种很难得的史料。

第四,游历实践。司马迁青年时代的游历实践,尔后又扈从封禅,足迹遍及祖国各地。所列之外,

走访下问,详为笔录,考察史迹逸闻,无不细致观察。举凡山川地理,河流沟渠,百姓生活,经济状况,物产分布,民风习俗,均在考察之列。经过编纂,记入《史记》,其中许多是难得的珍贵史料,保存下来,传之后世。司马迁的游历实践,使之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富了知识,拓展了心胸,思想进入新境界,认识达到新水平。这是《史记》有很强思想性的原因之一。

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史料的运用、史实的叙述、体例的创新三个方面:

第一,史料的运用。就是运用史实要确凿,叫做立准。立准史料,是史学家进行科学概括的根据。确定史实,积累史料,是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认准实际材料的可靠性,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对于书面史料的运用,要经过一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考证工夫,对某些可疑之处,可以存疑。《史记》一书,不单是专靠书面记载的,更重要的是靠采访所得的实际材料。这些材料,可以补充书面史料之不足,甚至可以纠正过去史籍中某些记载的不准确。

第二,史实的叙述。《史记》是通过实录的笔法来褒贬人物,辩明历史是非曲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是谓公正,叫做立正。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地做出“褒”、“贬”。他所褒扬的历史人物,是忠于国家,尽忠职守,爱护百姓,有节义性格的人物。他所贬斥的历史人物,是贪利忘义,阿谀苟合,轻视民力,武健严酷的人物。他对人物的观察,分清主次,突出优缺,加以褒贬。这种褒贬倾向,是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在我国封建社会时代的史学界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三,体例的创新。所谓创新,即前未有比,后可为法。《史记》是创新的典型。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独树一帜,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这个体例,组织完密,是一部富于科学性的创作。所以,从此例一定,指出了历史研究的成规,历代史家皆不能出其规范,真是“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从《史记》的编撰来看,我们应吸取哪些教益呢?

第一,历史材料对于史书的编纂是重要的,它是编写史书的基础。对众多的史料进行筛选,去伪存真,是编好一部传世信史的首途。司马迁的“四途取材”,指导了2000年来正史的编纂,表明了《史记》成为孕育数十亿部史书的温床。可见,史家首要的在于准确地把握丰富的史实,叫做立准。

第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史记》中十分可贵的在于它的人民性。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朴素唯物主义的至理名言,“夫阴阳四对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道理是反对天人感应的世界观的。

司马迁认为是财富不均造成了人对人的奴役现象。他反对豪取巧夺,认为“本富(指劳动而富)为上,末富(指商贾而富)次之,奸富(指榨取而富)最下”。他为下层人物立传,称赞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他称陈涉领导农民起义是“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在司马迁的史书中,大量记录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正表现了司马迁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

第三,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值得弘扬。实录精神,古时叫秉笔直书,用现代通俗的话说叫实事求是,这是史家的可贵精神。司马迁暴露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胆识,无不使人为之叹服。连那不同意司马迁思想观点的班固,也称其实录精神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的史学眼光是嶙峋不凡的,他对时代制度的演变,民族的生活习俗,阶级社会的人物面貌,思想潮流的发展倾向,都用多种多样的文学方式生动地描绘出来。

第四,司马迁的略古详今传统值得继承。他写汉以前的历史较为简略,主要是根据《诗》《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秦记》等古籍和历史传说,进行整理和编纂,以吸收前人成果。司马迁写当代史,不仅较为详细,而且全是创作。《史记》130篇,完全写汉以前历史的55篇,完全写当代史的51篇,重点(或大部分)写当代史的15篇。这样,《史记》中完全和重点写当代史的共66篇,加之其他篇章还记有当

代史的内容,可见,司马迁以 52 万余字,写 3 000 年的历史,竟以半数以上的篇幅记述近百年的当代史。这 100 年的历史,在全书数量的比重上要比过去的几个历史时代还要多,略古详今可见一般了。所以,刘知几说:“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这种略古详今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当做写史的一条基本原则。

第五,司马迁敢于揭发历史的黑暗面,抨击人类丑恶现象的政治勇气值得学习。在《史记》中,司马迁用那敏锐的眼光,正义的气魄,怀疑的神态,生动的笔墨,铿锵的言语,纵横古今,褒贬百代,大胆地进行历史批判。他不仅批判前朝的皇帝,而且批判本朝的皇帝。例如,他指责吕后“政不出房户”,汉文帝“赏太轻,罚太重”。他身为汉武帝史官,却对汉武帝批评甚多。一部《史记》,可称做是对汉武帝的批判书。他在《平准书》中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卖官鬻爵;在《封禅书》中说汉武帝迷信神仙,把女儿送给方士以求换取长生不死之药。他揭露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道破了统治者“仁义道德”的实质。他在《酷吏列传》中,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正直史学家的可贵品质。

二、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

我国北宋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司马光(公元 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仁宗宝元年间进士,史学家。他立志编撰《通志》,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写成战国迄秦共八卷,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从发凡起例到删削定稿,他都亲自动笔。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竭力反对。元丰八年,神宗死,哲宗即位,被召主持国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除新法。为相八个月,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封温国公。遗著尚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资治通鉴》全书 294 卷,约 300 余万字,所记历史上起周烈王 23 年(公元前 403 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 959 年),记载了包括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内的 16 个朝代的 1362 年的历史。

司马光呕心沥血用了 19 年磨砺成这部贯穿古今的通史型的编年史,把我国 1362 年间治乱兴亡的历史轨迹,“叙之井井,不漏不烦”,呈现在读者面前,贡献甚大。《资治通鉴》为保存祖国古代文化,传播祖国古代历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仍为我们研究祖国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宋末,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四库全书总目》说《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清朝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民初梁启超说:“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又说:“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岑仲勉更说:“《资治通鉴》是我国极负盛名之通史,论到编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详细,文字的简洁,综合评论,确算它首屈一指。”

司马光对这部名著付出了极为重大的代价,正如他本人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编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渊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臣今骸骨癯瘠,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据历史记载,表中所言,确非虚夸之词,而是真实情况的汇报。司马光晚年的全部精力,确是“尽于此书”。在长达 19 年的写史时间里,精力消耗过大,故成书后仅一年多时间,司马光便与世长辞了。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除了有三大助手分工合作,共同努力外,还有一套科学的编纂方法。编纂分三个步骤:先作丛目,次作长编,最后定稿。每人都严格按这三个步骤去做,所以全书的体例、书法、史料考订、文章剪裁都能做到协调一致。

“从目”就是按时间先后做出专题中料分类排比,其要求就是标列“事目”注明“篇卷”所出,即要求

在做“长篇”之前,必须将所有史料做一次爬梳排比分类工作,以做到胸中有数。至于怎样编“丛目”,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说:“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但稍与其事相涉,即注之,过多不害。”

“长编”,即初稿。它的编写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就是编出一个十分详细的编年史。长编既非史料,亦非史著,而是介乎史料与史著之间,是史料向史著过渡的重要步骤。“初步征集之史料,是为原料;继而整理之史料,是为长编;最后蕙成之史著,是为定本,此为修史必经之序。”着手编写长编时,须将从丛中所有史料,重新检阅一遍,经过认真筛选,决定取舍,重新予以组织,并在文字上初步加工修饰。凡是事同文异者,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相详略,可互为补充者,则自用文辞予以综合。凡遇事迹,年月有违戾不同者,则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事实者编入。长编正文,一律用大字书写。余者注于其下,以说明其所以取此而舍彼之意也。由于编写前即已明确这些规范,所以在编写时能够做到步调一致,格式整齐,给司马光最后定稿打下了坚实基础。据史实记载,丛目、长编大多由三大助手分担,最后删削润色,考订异同,决定取舍,写成定稿,这是一个繁重的任务,一道极为精细而艰巨的程序,完全由司马光一人独自承担。一部六百多卷的唐纪长编,经过删削,最后只剩下八十一卷。由长编到定稿,删减达三分之二,删削繁冗,考订异同,字斟句酌,文字修饰,工作非常艰巨。《通鉴》虽属集体编写,可是经过司马光的铨定,繁简得宜,文字优美,语言生动,浑然一体,如出一人之手。这样一套编史的完整程序,对后世史家治史影响深远。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便是完全按照《通鉴》编修的义例和方法来编写的。明、清两代几部编年体史书,无一不是仿效《通鉴》的编修方法。

《通鉴》成书后,作者自知卷帙繁多,阅读不易,为便于检阅,遂撮取事目和精要,写成《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收提纲挈领之效。后又恐目录过于简略,而不便尽其首尾,又补作《通鉴举要历》80卷,《通鉴节文》60卷。还有《通鉴释例》一卷,记述修书凡例及与书局官属往来书札,以与《通鉴》本书相说明。为使后继者了解他们编史精选实际,竟将引用史料中的诸家异说以及自己辩正谬误、考订异同的结果,编成《通鉴考异》30卷,以明其去取之故。这种对史料精选的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今世仍可效法。写一书而另著多种作品相辅佐,特别是“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在此前史学家中尚属仅见。

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其目的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迂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可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是蓄志已久,只因“私家力薄”,而“无由可成”。一方面,他深感千余年来,史书多多,却没有一部简明系统的通史,致使“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有必要编一部简明通史,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另一方面,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供君主治国之借鉴也。

三、两司马治史之比较

司马迁与司马光,是我国古代史坛的两位大史学家。司马迁所撰的《史记》,司马光所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史籍中的两部名著。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司马迁是西汉人,处于封建社会前期;司马光是北宋人,处于封建社会后期。所著的体例不同,《史记》为纪传体,以写历史人物为主;《通鉴》为编年体,以写政治史为主。因此,将两司马进行比较有一定难处,若想做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更非易事。但两司马都写了三家分晋至西汉武帝时期一段的历史,就这一点来说,进行比较研究,尚有一定道理。

司马迁著《史记》在前,司马光编《通鉴》在后,因此,司马光编中以《史记》为主要参考书,大量采摘其

内容,在写史事方面,《通鉴》多同于《史记》,这是可以理解、不言自明的道理。但《通鉴》在纪事和论述方面,司马光对《史记》不仅有删减和增补,而且有所修改。

自司马迁做《史记》,创立纪传体之后,班固以下的史家,多仿其例。“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显示了其巨大优越性。记述全面,包罗宏富的纪传体史籍逐渐取代编年体而成为汉唐之间史书的主流。我国旧史坛从两汉到五代是纪传体兴起而编年体中衰的时期,直到两宋,风气才有新的变化。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行世之后,补头、续尾、节要、仿作之书络绎不绝,迅速在史学界掀起一股“编年热”。司马光在编年体发展的长河中,起了总结旧例兼开创新体的作用。

编年体史籍,最重时间脉络。“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季),以时系年”,这就是编年体。我国先秦时期,基本上是编年体独盛史坛的局面,盛行《春秋》《左传》《竹书纪年》式的早期编年体,以年月为次,记事简明扼要。至汉唐转而盛行纪传体,但这种纪传体也吸收了早期编年体重视时间次序,脉络清晰,在书首“本纪”,采用编年法,凡一朝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重大事件、重要典制,皆用简短文字,依次列出的特点。至《资治通鉴》问世,又盛行编年体。但与早期编年体不同,司马光总结了以往编年史家的经验,发展和完善了这种古老的体裁,代表了我国古代编年史的最高成就。他吸收了纪传体以“列传”叙述人物生平事迹本末,以“书”、“志”叙述典制兴废演变本末的优点,纪事体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萌生了纪事本末体的雏形。

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是有区别的。前者采用时间本位,后者采用事件本位。而《通鉴》则时间本位与事件本位兼而有之,但以时间本位为主。第一,《通鉴》对某些重要历史事件,采用连载法,始末连贯,因果彰显,在全书中成为相对独立的章节。第二,《通鉴》对某个时期的历史,常集中叙述其主要事件,同时兼顾其他,主次有别,中心突出。第三,《通鉴》对某些不宜单独列出条目,而又值得一提的“次等”史事,多用附叙法,先述一事,逐后连及其他。第四,《通鉴》记事,每每采用追叙法,先溯由来,再及本事。第五,《通鉴》记事,亦用补叙法,首先依时记事,其次点明后果。上述连载法,主次有别法,附叙法,追叙法,补叙法,在时间本位与事件本位相抵触的情况下,由于《通鉴》重视交待史事的本末因果,常常并不拘泥于“以事系日”、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逐条排列史事的程式,而采用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写法,似有突破编年体的趋向。

两司马的历史观最大的相同点,都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唯心史观。两司马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如秦朝兴亡、项羽成败、文景之治、武帝为政等,都比较一致。

两司马的史学,相同之处较多,但不同之处也确不少。

第一,历史视野宽广的不同。司马迁写史,驰骋古今,褒贬社会,写历史上各个阶层人物的笔墨很浓,观察历史的视野很宽。司马光写史,则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国家之兴衰,乃指朝代的更迭,政治之得失。生民之休戚,乃指广大人民的喜乐与忧虑。

由于视野宽广的不同,随之而来,史论也不同。司马迁的史论虽然往往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发,但对古今之变,历史大事也不放过。其言论之纵放,才情之横溢,思想之敏锐,观点之深刻,都充分表露出来了。司马光之史论,则多是政论,谈历史大势者甚少。

第二,对待史事的情感不同。司马迁对待史事非常动感情,往往情不自禁地流涕、悲痛、叹息。司马光的感情与司马迁不同,他以为读书做事,应“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从之。前贤高奇之论,皆如面墙”。就是说,应该信从那些合乎封建礼教,又可为现实政治所用的东西,而不需要往昔学者那些“高奇之论”。这是由于两人的生活阅历不同。司马迁有深厚的家学传统,仕为朗中和太史令,接触朝廷上下和社会各阶层,又身遭腐刑之辱,所以,对历史、对社会,尤其对君主专制和社会下层,了解较广较深。而司马光受儒家影响很深,历官较多,及至宰相,接触的主要是社会上层,又处于政治漩涡之中,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关键人物,所以,对封建政治极为了解和关注。

第三,取材之不同。司马迁写战国史、秦汉史,是写近现代史,宜详宜细。既根据文献资料、档案、文件,又采用传闻、口碑及调查访问所得,所以,其书多载生动的故事,甚至包含有一些夸张了的传奇内容。

而司马光写战国史、秦汉史,是写古代史,宜简宜略。著书时,历史文献多在,足供摘采。多录自《史记》,亦偶采于《战国策》《汉书》及其他书籍。

第四,注重点不同。司马迁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放笔历史纵横,大谈人生情感。司马光则着重以史为鉴,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

由于注重点不同,因而史笔也不同。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往往要从人物的语言、行动、神态、品格、情感等方面入手,落墨细腻,曲尽其妙,生动传神。司马光写历史人物则较为正统,较为呆板。

第五,思想倾向不同。虽然他们都信封建,以写帝王为中心,但司马迁对封建专制有抵触情绪,反对严刑酷法。司马光则拥护封建专制。他们虽然都信儒学,但司马迁不独尊儒术,是“先黄老而后六经”。司马光则强调孔孟礼教,思想保守,反对异端,反对改革,非礼勿言。

总而言之,两司马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其光彩夺目的史学业绩,各有其突出的历史地位。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司马光为封建帝王统治做参谋,以史为鉴,是正宗史学。应该说,各有长短,各有千秋。但就比较而言,无论从历史编纂,还是从历史观点,历史文学等方面来看,司马迁都比司马光略胜一筹。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Historiographies of Two SIMA

YU Wen-ran, CHEN Nai-xuan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YU Wen-ran (1963-),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history and DENG Xiao-ping Theory; CHEN Nai-xuan (1926-),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history, MAO Ze-dong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 Theory.

Abstract SIMA Qian and SIMA Guang were the great historians of China, their books—Historical Record and General Appraisements Taking as Management had produced important effects on our historical science. They belong to different era, their books were different too. As for the style, the former was biography, the latter was annalistie. Moreover, they are difference in the vision of historical field and the feeling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accept or reject of historical data and so on.

Key words 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SIMA Guang; General Appraisements Taking as Management; comparative research